



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 的经济文化联系*

岑家梧 遗作

女真是我国古老的民族，很早就分布在东北的长白山和黑龙江之间。契丹建国以后，女真的一部分被迁到辽阳以南，和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处，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叫做“熟女真”；原住在粟末江之北，宁江州之东的，社会经济发展较慢，叫做“生女真”。

十世纪以来，“生女真”完颜部的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在绥可作酋长的时代，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到了石鲁作酋长时，“稍立条教为治部落”，^①私有财产已经产生，阶级分化较为显著。十一世纪末，完颜部的首领盈歌击败了乌古论部，“尽杀其城中渠长”。^②“取其孥累资产而还”，^③表明这时完颜部的奴隶制不断地发展，因而经常对外发动以掠夺财富和奴隶为目的的战争。到了十二世纪初，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归并邻近少数民族的部落，1114年发动反辽战争，次年建立金政权，标志着女真奴隶占有制早已形成。

金灭辽以后，转而对宋发动战争，占据了华北的广大地区，继契丹之后和宋朝又一次形成了南北对峙，直至1234年始为蒙古所灭。在金统治下的我国北方地区，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大致可分为：（一）绝大部分是汉族的先进农业地区，属于后期封建制；（二）渤海和契丹的一部分农业地区，属于前期封建制；（三）女真的农牧地区和契丹的一部分牧区，属于奴隶制；（四）东北、西北边境的少数民族，属于原始公社制或早期奴隶制。汉族的封建制和女真的奴隶制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早期奴隶制或原始公社制，原来只是生产方式上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④历史上任何一个存在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社会，剥削阶级在压迫和剥削本民族劳动人民的同时，总是要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的人民，因而在金统治的一百余年中，民族矛盾非常尖锐，民族斗争极为激烈。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⑤当时的民族矛盾实质上是当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即：一方面是女真奴隶主贵族，为了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奴隶制剥削，发动掠夺性的战争，妄图改变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把落后的奴隶制强加于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实行民族压迫制度，挑拨民族矛盾，排斥和歧视汉族的先进文化，制造民族隔阂，并企图割断各民族间的

*本篇系岑家梧先生遗著《辽宋金时代民族关系史稿》之第二部分——编者。

①《金史》卷1，《世纪》。

②《金史》卷1，《世纪》。

③《金史》卷67，《留可传》。

④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09页。

⑤毛主席：《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见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



联系；另一方面以汉族人民为首，包括契丹等族人民在内，为了反对女真奴隶主贵族的黑暗统治，为了突破种种障碍，维护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抗金斗争。经过了长期的阶级斗争，大大地打击了女真的奴隶制，不仅使中原先进地区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东北地区的生产在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并促进了女真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使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汉族和各族人民共同进行阶级斗争，推动了我国历史的不断前进。

一、女真和汉族的交错杂居及汉族对 女真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

女真奴隶主贵族，从阿骨打发动反辽战争至吴乞买侵宋的初期，经常把受掠的大批汉人迁入东北，特别是为了巩固女真的根据地会宁（黑龙江阿城南的白城），即所谓“内地”，“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①天辅六年（1122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而实之。”^②天会元年（1123年）四月，又把“燕京豪族及工匠由松亭关从之内地。”^③同年十一月，“从迁、润、宋、隰四州之民于沈州”。^④天会五年（1127年），金兵从汴京北撤时，“华人（即汉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⑤从此，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地区，增加了大批的汉族劳动人民和女真、契丹等族交错杂居。

随着金控制地区的扩大，女真奴隶主贵族又把他们的猛安谋克从东北迁入中原，以便巩固其统治。天会十一年（1135年）“秋，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棋罗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结屯而起。”^⑥皇统五年（1145年）又“制屯田军。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中州，与百姓杂处”，“自燕山之南，淮洧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⑦“今屯田之处，大名府路，山东东西两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河南路关西路四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余千户，每千户止三四百人，多不过五百。”^⑧到了贞元、正隆年间，完颜亮为了分散女真旧贵族的力量，并企图进一步南侵，“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勛、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幹论、和尚、胡刺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果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⑨宣宗南渡以后，又把河北的猛安谋克迁入河南。根据贞祐四年（1216年）陈规所说：迁入的军户一百多万人，经过淘汰之后，还有“四十二万有奇。”^⑩女真的猛安谋克经过这几次的大规模南迁，在华北地区又和汉族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

①《金史》卷113，《张觉传》。

②《金史》卷46，《食货》一，《户口》。

③《金史》卷2，《太祖纪》。

④《金史》卷3，《太宗纪》。

⑤李心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辛酉。

⑥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2，《熙宗》四。

⑦《大金国志》卷12，《熙宗》四。

⑧《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张棣：《金虏图经》。

⑨《金史》卷44，《兵志》。

⑩《金史》卷109，《陈规传》。

北方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虽然同样受到女真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在历史上长期以来,汉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走在少数民族的前面,因而在金代汉族和女真交错杂居、长期接触以后,也毫无例外地继续发挥它的先进主体作用,给女真和其他民族以巨大的影响。

第一,促进了东北地区生产的发展。女真的社会生产,原来比较落后。当他们分布在黑水(黑龙江)一带的时候,“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夏则随水草以居,冬则入住其中,迁徙不常。”到了绥可的时代,“乃徙居海古水(阿什河)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①同时又“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渔猎经济的比重还很大。“其市无钱,以物博易,无工匠。”^②说明农业、手工业和交换都不甚发达。金初,女真奴隶主贵族强迫大批汉族农民和手工业者迁入东北地区,带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后,他们和东北的各族人民,共同开辟边疆,并促进女真社会生产的发展。

就今天考古学的发现,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水平很高,如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遗址,距金都上京会宁府一百公里,隔江相望,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市镇。出土有宣和、正隆、大定钱币,属于金代前期。出土铁器很多,共七百余件,有武器、马具、交通工具、手工业工具、农具和生活用具等。农具有犁铧、犁碗子(铧上的反土器),耢头(铧上的分土器)、锄、镢、镰、手镰、锹、铡刀、垛叉等。犁铧有大小两种,铧上的附加分土器也有两种。收获用的镰刀有三种,其它各项农具,基本上和解放前东北农村中所使用的农具接近。交通工具共四十余种,其中有车箱三十件,分六稜车箱、六爪车箱、五爪小箱及三爪小箱四种。手工业工具有铸、锯、斧、凿、铲、锉、刮皮刀、钳子等。生活用具锻铁制的居多,有菜刀、剪刀、小刀、铁勾子、抹泥板、抽屜拉手、各种铁钻、钥匙、纸凿子(打冥钱用器)大小铁圈及各种门鼻、穿条、铁钉,铸铁制的有六耳大锅、铁杈、熨斗等,从各种铁制工具看,冶铁技术相当成熟。^③这说明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黑龙江地区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在辽宁方面,如新民县的前当铺及绥中县的城后村,都发现金代遗址,出土大批的铁器。所有农具、车器、手工业用具及生活用具,大体上和黑龙江肇东县发现的相同。^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金代东北路界壕的麒麟河边堡中,也发现了典型的铁犁铧,^⑤这也说明了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对当时边防军戍地区起了很大的作用。

根据明昌四年(1193年)的统计:“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十七万六千有余,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所支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由于“收多支少,遇灾足以赈济”,因而停止设置“常平仓。”^⑥这个统计数字,一方面说明女真奴隶主贵族对劳动人民剥削的惨重,另一方面又表明黑龙江等地区农业生产的迅速提高。

第二,促进女真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金初的猛安谋克是女真奴隶制的基层组

①《金史》卷1,《世纪》。

②《大金国志》卷39,《初兴风土》。

③参阅肇东县博物馆:《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2期。

④王增新:《辽宁新民县前当铺金元遗址》及《辽宁绥中县城后村金元遗址》二文,均刊《考古》1960年第2期。

⑤黑龙江博物馆:《金东北路界壕边堡调查》,《考古》1961年第5期。

⑥《金史》卷50,《食货》五,《常平仓》。

织。阿骨打反辽时,就把辽境内的汉人编入猛安谋克,当作奴隶使用。如把诸州汉人六十五户编为一谋克,由汉人王六儿率领,^①后来又强迫从中原掠夺的汉人北迁,“五百人为一队,虏(指女真统治者)以数十骑追之,如驱羊豕”,^②同样编入猛安谋克,抑为奴隶。这就引起汉族及契丹等族人民的坚决反抗。天会元年(1123年),为了防止新迁“民户”的逃亡和反抗,阿骨打曾经命令地方官吏“深加存恤”;不久,对被虏及鬻身为奴的又允许“自赎为良。”^③天会二年(1124年),吴乞买攻陷平州,由于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不得不停止把汉人编入猛安谋克,“诸部降人,但置长吏以下,从汉官文号。”^④到了熙宗天眷、皇统之间,终于废除了辽东地区汉人和渤海的猛安谋克。^⑤女真的奴隶制从此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猛安谋克大批迁入华北以后,由于华北地区的生产水平较高,猛安谋克内部已经从原来的牛头地地改变为“计口授田”的屯田制,卖掉奴隶,出租土地等新的封建生产关系逐渐出现。同时猛安谋克户和汉人杂处,女真社会的奴隶制无论内部外部和封建社会的矛盾更加尖锐。特别是女真统治者在河北、山东、山西搜刮土地、掠人为奴隶,实行反动的奴隶制剥削,到处都遭到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如天眷元年(1138年)“元帅府下令:诸欠公私债无可还者,没身及家属为奴婢偿之。”便引起了“百姓怨愤,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⑥完颜亮时期在山东大量搜刮土地,“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乃付贫户。”到了贞祐三年(1215年),高汝砺还认为汉人和女真人“互相憎疾,今犹未已。”^⑦可见五、六十年来,土地问题一直引起汉族人民和女真统治者之间的尖锐矛盾。事实上,从宋靖康、建炎年间黄河南北的忠义民军,直至以后金境内山东、河北、陕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契丹人边六斤、王三及撒八,耶律斡罕等的前后起义,都有力地打击了女真的反动统治。经过了阶级斗争的不断冲击,女真统治者终于不得不改变了奴隶制剥削,逐渐向封建制转化。如恩格斯所指出:“在长时期的征服中间,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也不得不和那个国度被征服以后所保有的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⑧。

女真猛安谋克的封建化,从金世宗时起就十分剧烈。当时“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穡,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种,取租而已。”可见租佃封建关系已经普遍存在,又还有不少猛安谋克户出卖了奴隶。女真统治者为了维护奴隶制,在大定二十一年曾经“禁卖奴婢,”并遣派官吏检查户口。“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计佃于人。”^⑨可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始终是不以女真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到了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李愈已经看出封建制比奴隶制的优越性。他建议在西北沿边设置猛安谋克屯田时,便主张“田给予军者许募汉人佃种,不必远挽牛头粟而兵自富强。”^⑩到泰和

①《金史》卷44,《兵志》。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99,引《汴都记》。

③《金史》卷2,《太祖纪》。

④《金史》卷44,《兵志》;卷55,《百官志》。

⑤《金史》卷44,《兵志》;卷80,《大奥传》。

⑥《大金国志》卷10,《熙宗》二;《续资治通鉴》卷120,《高宗记》一,绍兴8年6月癸未。

⑦《金史》卷107,《高汝砺传》。

⑧恩格斯:《反杜林论》,1956年版,189页。

⑨《金史》卷47,《食货志》二,《田制》。

⑩《金史》卷96,《李愈传》。

四年(1204年),女真统治者不得不“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①正式承认猛安谋克出租土地的合法性。同时章宗初年,又正式宣布“宫籍监户,旧系睿宗及大行皇帝皇考之奴婢者,悉放为良。”^②明昌二年(1191年)“更定奴诱良法。”^③大量解放了“二税户”,“由是二税户多为良者。”^④这就表明了女真社会最后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⑤

第三,女真语言文化的汉化。金初,女真奴隶主贵族实行民族压迫制度,制造民族隔阂。女真人叫做本户,汉人及其他民族叫做杂户。汉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法律上受到歧视。“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⑥排斥汉族文化,“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⑦猛安谋克迁入华北地区,为了防止女真和汉人接触,猛安谋克户独自“筑垒于村落间,”^⑧“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⑨甚至有些猛安谋克户和汉人的土地犬牙相入,也要强迫交换,使女真户“自为保聚”。^⑩可是如列宁指出:“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⑪汉族的经济文化,在我国各民族中居于先进的地位,对少数民族又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在女真和汉族长期接触、互相学习的过程中,“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⑫“他们为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采用了他们的语言。”^⑬当时女真人学习汉语,风俗习惯和文化各方面的汉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女真统治者任何的禁令和措施,都是阻挡不了的。

女真人学习汉语是有长期历史的。早在辽代,黄龙府(吉林农安)一带多民族地区,已经使用汉语为共同语言。^⑭金代南迁到华北地区的猛安谋克户,和汉族接触频繁,学习汉语当然十分需要。就是女真的故地会宁,在世宗时期已经有许多女真人不通晓女真的语言文字,^⑮女真的歌曲也没有人唱了。^⑯女真统治者为了防止汉化,大定十四年(1174年)规定:“应卫士有不闲女真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⑰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

① 《金史》卷12,《章宗纪》四。

② 《金史》卷9,《章宗纪》一。

③ 《金史》卷9,《章宗纪》一。

④ 《金史》卷94,《内族襄传》。

⑤ 参看张付泉:《论金代猛安谋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破坏的原因》,《文史哲》1963年第一期;又《历史教学》1964年2月号,《问题解答》53—54页。

⑥ 《大金国志》卷5,《太宗》三。

⑦ 《金史》卷8,《世宗纪》下。

⑧ 《大金国志》卷12,《熙宗》四。

⑨ 《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张棣:《金虏图经》。

⑩ 《金史》卷70,《思敬传》。

⑪ 《列宁全集》第19卷,504页。

⑫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330页。

⑬ 恩格斯:《反杜林论》,189页。

⑭ 《大金国志》卷40,《许事使行程录》第33程。

⑮ 《金史》卷7,《世宗纪》中。

⑯ 《金史》卷8,《世宗纪》下。

⑰ 《金史》卷7,《世宗纪》中。

又提倡学习女真语言,“大抵习本朝语为善,不习则淳风将弃。”^①同一年,完颜璟(后来的章宗)进封为原王,“人以国语(女真语)谢,世宗喜,且为之感动,谓宰臣曰:‘朕尝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即完颜璟)语甚习……’”^②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又规定:“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真字经史,然后承袭,”^③由此可见,女真贵族中普遍地以汉语为交际工具,懂女真语的是不多了。

大定十三年(1173年)和明昌二年(1181年),女真统治者都命令女真人不得译为汉姓。^④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和泰和七年(1207年),又命令“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⑤但是简译汉姓或改易汉姓的女真人越来越多。金代女真(包括契丹和奚)改用汉姓的有:“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乞石烈曰高,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刺曰刘,幹勒曰石,纳剌曰康,夹谷曰同,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幹准曰赵,阿曲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⑥此外,还有完颜改为陈,乞石烈为卢,赤盏为张等等。^⑦

女真风俗习惯的汉化也是极其显著的。“金人自兴兵之后,虽渐染华风,然其国中之俗如故。已而往来中国,(指中原汉族地区)汴洛之士,多至其都,于是四时节序,皆与中国侔矣。”^⑧上京会宁“燕饮音乐,皆习汉风。”^⑨南方的奕棋双陆,^⑩上元灯节^⑪等习俗也都为女真所吸收。同时,随着女真社会的封建化,汉族封建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如南宋的张邵于建炎三年(1129年)使金,后来被徙居会宁,“金人多从之学。”^⑫洪皓留居北方十余年,“虽久在北庭,不堪其苦,然为金人所敬,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钁梓,”^⑬完颜亶(熙宗)从少受到汉族封建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教育,懂得汉族的诗文,学习汉族文士的生活方式,“儒服、烹茶、焚香、奕棋、战象”,被认为“徒失女真之本态”。^⑭金世宗极力反对汉化,却不能阻止他的子孙学习汉族的诗画,有的还“好变夷狄(指女真)风俗,行中国(指中原汉族)礼乐如魏孝文。”^⑮

女真妇女的装饰,从灭辽侵宋以后,逐渐汉化,“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⑯女

①《金史》卷8,《世宗纪》下。

②《金史》卷9,《章宗纪》一。

③《金史》卷8,《世宗纪》下。

④《金史》卷7,《世宗纪》中;卷9《章宗纪》一。

⑤《金史》卷8,《世宗纪》下;卷12,《章宗纪》四。

⑥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中华书局1959年版,14页《金人姓氏》。

⑦参看陈述:《金史拾补五种》156—178页,科学出版社,1960年。

⑧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建炎三年正月甲午。

⑨《金史》卷7,《世宗纪》中。

⑩洪皓:《松漠纪闻》。

⑪洪皓:《松漠纪闻》,《女真旧不知岁月》条。

⑫《宋史》卷373,《张邵传》。

⑬《宋史》卷373,《洪皓传》。

⑭《三朝北盟会编》卷166,引张江:《金虏节要》。

⑮刘祁:《归潜志》卷12,《辩亡》。

⑯《大金国志》卷39,《男女·冠服》。

真统治者曾经三令五申,禁止学南人装束。^①可见女真人穿着汉人服饰的普遍。

华北地区的女真和汉族长期接触,“彼耕此种”,“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②互相婚姻的也很多。明昌二年(1191年)女真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间的矛盾,不得不明令“递相婚姻”,^③泰和六年(1206年)十一月再一次宣布:“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④民族间婚姻界限的解除,大大有利于彼此的友好来往及民族间的融合。

二、宋金间的经济联系

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集权制国家,各族人民通过长期友好往来和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形成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金代女真统治者发动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政治上长期分裂割据,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曾经受到很大的限制。可是由于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又通过各族人民的坚决斗争,最后又使这种联系得到继续发展和巩固。

早在辽代,女真出产的北珠曾经通过榷场销入宋地。宋建隆以来,他们又经常从苏州(辽宁金县)泛海至登州(山东蓬莱)卖马。^⑤北宋覆灭,南宋建炎年间(金天会年间)山东海、密诸州的粮食缺乏,米麦腾贵,南方福建、江、浙的商人已经将粮食从海道大批北运,因而南宋统治者于建炎四年(1130年)命令“福建、温、台、明、越、通、泰、苏、秀等州,有海船民户及尝作水手之人,权行籍定,五家为保,毋得发船往东京,犯者并行军法。”^⑥绍兴二年(1132年)又禁止江浙商人将米、帛从海道运往山东。^⑦说明南北民间贸易在战争频繁的时期还未中断。

绍兴和议以后,宋金双方在边境设置榷场进行贸易。宋境榷场的设置地点有盱眙军(安徽盱眙县)、楚州的北神镇、杨家寨(淮安县西)、淮阴的磨盘(江苏淮阳市)、安丰军的水寨、花靥镇(寿县西北)、枣阳军(湖北枣阳县)、光州(河南光山县)。金境设置榷场的地点有:泗州、寿州(安徽寿县北)、颍州(安徽阜县)、蔡州(河南汝南县)、唐州(河北唐河县)、邓州(河南邓县)、凤翔府(陕西凤翔县)、秦州(甘肃天水县)、巩州(甘肃陇西县)、洮州(甘肃临潭县)、密州胶西县(山东胶县)。^⑧以上的榷场从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1142年)起陆续开设,后来在完颜亮南侵及开禧北伐时期,中间都曾经停止贸易。

通过榷场贸易,宋境输出的主要是茶。茶是北方契丹及其他民族的日常饮料,“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⑨金统治区除在河南种茶外,都不产茶,因而必须向宋境大量购买。南宋统治者规定:“盱眙榷场,将南客贩到草末茶,止许与本场官折博,不得令南北客相见博易茶货。”^⑩对于福建出产的腊茶则完全禁止民间买卖,专由官府控制。“及

①《金史》卷8,《世宗纪》下,大定27年12月戊子;卷12,《章宗纪》四,泰和七年九月壬寅。

②《金史》卷88,《唐括安礼传》。

③《金史》卷9,《章宗纪》一。

④《金史》卷12,《章宗纪》四。

⑤《大金国志》卷1,《太祖》。

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壬申。

⑦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0,绍兴二年三月庚子。

⑧参看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卷,吴杰译,1963年商务版,206、207页。

⑨《金史》卷49,《食货志》四,《茶》。

⑩《宋会要辑稿》第140册,5487页,《食货》38,绍兴12年10月6日。

兴榷场，遂取腊茶为榷茶本，寻禁茶私贩，官尽榷之。”^①金每年给宋买茶的费用“不下百万”。因此，泰和五年（1205年）规定：“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②到了元光二年（1223年）二月，据说“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因此金朝又规定：“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③一禁再禁，仍然禁止不了，可见南方的茶北销数量之大。

香药、虔布、匹帛、木棉、象牙、玳瑁之类，也是南宋对金的输出品。这些东西是由南宋朝廷拨给榷场，作为贸易本钱的。如绍兴十二年创置榷场的时候，就“降到本钱十六万五千八百余贯，系以香药杂物等组计作本。”^④乾道元年（1165年），和光州郭均又曾经申请“朝廷支降本钱，或用虔布、木棉、象牙、玳瑁等物折计降下。”^⑤乾道九年（1173年）南宋朝廷又“于左藏库支給三分以上檀香三十斤”，着专人送往安丰军榷场博易丝绢。^⑥牛也是南宋榷场的输出商品，每年输出七、八万头，可是大部分是民间交易，没有通过榷场，所以榷场输出牛只收入的税钱很少。^⑦此外，南宋输入金境的还有生姜、陈皮之类的商品。^⑧

从金榷场输入南宋的货物主要是丝、绢。^⑨还有甘草、^⑩紫草、红花等药品。^⑪

榷场的贸易，数量很大，泗州榷场“大定间，岁获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安元年（1196年）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宋亦岁得课四万三千贯。”^⑫但是榷场贸易，官府的课税很重，同时南北商人不能直接交易，如宋盱眙军规定：“商人货百十（千）以下者十人为保，留其货之半在场，以其半赴泗州榷场博易，俟得北物，复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价之来，两边商人，各处一廊，以货呈主管官牙人，往来评议，毋得相见。每交易千钱，各收利息钱入官。”^⑬这样就使贸易受到很大的限制，大大不能满足南北各族人民的需要，因此，各族人民不得不在榷场以外进行民间贸易。

民间贸易是在南北各族人民在不断地和宋金统治者进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宋金朝廷为了维持政治上南北分裂的局面以及垄断南北的经济贸易，曾经颁布许多法令，禁止民间贸易，可是南北经济联系是任何统治阶级都割断不了的。各族人民仍然采取了各种斗争方式，冲破了统治者制造的重重障碍，进行贸易，因而民间贸易不论商品的种类和数量，都比榷场的多得多。

民间贸易从宋输入金境的，仍然以茶为主。绍兴十四年（1144年）南宋朝廷明令禁止民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12年10月丁亥。

② 《金史》卷49，《食货志》四，《茶》。

③ 《金史》卷49，《食货志》四，《茶》。

④ 《宋会要辑稿》第140册，《食货》38，隆兴2年12月18日。

⑤ 《宋会要辑稿》第140册，5487页，《食货》38，乾道元年9月15日。

⑥ 《宋会要辑稿》第140册，5488页，《食货》38，乾道元年2月7日。

⑦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6，绍兴30年9月壬申。

⑧ 《三朝北盟会编》卷149，绍兴元年12月8日。

⑨ 《金史》卷49，《食货志》四，《茶》。

⑩ 《三朝北盟会编》卷149，绍兴元年12月8日。

⑪ 《宋会要辑稿》第140册，5487页，《食货》38，乾道5年10月17日。

⑫ 《金史》卷50，《食货志》五，《榷场》。

⑬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5，绍兴12年5月乙巳。

间运茶渡淮,若果被截获,则“以一斤比二斤推赏。”但“客贩所以冒法私渡淮河,一则获利至优,二则避免榷场贴纳官钱。”^①所以不特鼎(湖南常德)、澧(湖南澧县东南)、归(湖北秭归)、峡(湖北宜昌县西北)等州出产的茶大量运销金境,^②连到福建的腊茶,也突破了南宋朝廷的控制,从海道运到金境。^③此外,由于经蒋州(河南潢川县)运茶给北方商人的很多,致使“榷场通货之茶”,大为减少。^④生姜从楚州北神镇运过淮北的很多,^⑤绢、布、丝、麻之类则从川、陕一带贩入金境。^⑥耕牛和马也有不少运到北方贩卖。淳熙五年(1177年)南宋朝廷曾经明令:“湖北、京西路沿边州县,自今客人辄以耕牛并战马负茶过北界者,并依军法”。^⑦

从金输入宋境的是盐。金解州(山西解县)产盐丰富,金统治者是允许官民通过榷场输入宋境的。^⑧但宋朝统治者为了强迫人民购买“官盐”,禁止“解盐”入境。“解盐”比南宋的“官盐”^⑨“价廉而味重”,因而利路(四川广元一带)关外诸州,“人竞贩卖,啸聚边境,动辄成群。”^⑩京西路的人民,也沿着光化军(湖北光化)、均州(湖北均县北)、房州(湖北房县)的小路通过金境购买“解盐”,因而这些地区的人民,“全食解盐,淮盐绝无到者。”^⑪

由于宋金的贸易频繁,南宋的钱币流入金境的数量很大。宋朝曾经严禁铜钱出界,渡淮的人必须经过检查。但由于金境铜钱缺乏,“南客以一缗过淮,则为数缗之用。”^⑫“唐(河南唐河县)、邓(河南邓县)间钱陌,以一二十数当百。”^⑬同时,民间贸易,特别是购买北方的“解盐”,都是以钱币交易,^⑭所以宋钱大量北流。从考古发现的材料看来,金统治区到处都出土宋钱。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郊大青山哈拉沁沟的金代遗址,有绍兴通宝和大定通宝共出。^⑮辽宁新民县前当辅金代遗址有建炎、绍兴等和嘉泰钱共出。^⑯黑龙江肇东县金代遗址,也有宣和等钱和正隆、大定共出。^⑰可见宋钱在金境流通之广。

南宋的银两也通过民间贩卖输入金境。由于“泗州榷场广将北绢低价易银”,许多商人从江、浙州军贩银出去,他们“从建康府界东阳(浙江金华)过渡至真州(江苏仪征),取小路径至盱眙军过河博易。”^⑱此外,根据淳熙年间的禁令,知道淮河州军沿边,特别是正

① 《宋会要辑稿》第136册,5345页,《食货志》31,绍兴14年8月26日。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7,绍兴27年7月庚午。

③ 《宋史》卷184,《食货志》下,六,《茶》下。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6,绍兴30年9月壬申。

⑤ 《宋会要辑稿》第140册,5486页,《食货》38,隆兴2年12月18日。

⑥ 《宋会要辑稿》第140册,5485—86页,《食货》38,隆兴2年2月21日。

⑦ 《宋会要辑稿》第166册,6555页,《刑法》2,淳熙5年6月20日。

⑧ 《金史》卷49,《食货》四,《盐》。

⑨ 《宋会要辑稿》第134册,5269—5270页,《食货》27,乾道7年4月22日。

⑩ 《宋会要辑稿》第135册,5282页,《食货》28,淳熙5年2月12日。

⑪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6,绍兴30年9月壬申。

⑫ 《宋会要辑稿》第135册,5282页,《食货》28,淳熙5年2月12日。

⑬ 同上。

⑭ 郑隆:《呼和浩特北郊大青山哈拉沁沟发现金代文物》,《考古》1959年第9期。

⑮ 王增新:《辽宁新民县前当辅金元遗址》,《考古》1960年第2期。

⑯ 肇东县博物馆:《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2期。

⑰ 《宋会要辑稿》第140册,5488页,《食货》38,乾道9年3月2日。

阳水寨一带,人们使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透漏钱银过界的很多。

三、女真和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

在金统治区内,除了汉族以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早在收国二年(1116年),阿骨打曾经宣布:在金控制下的民族有:契丹、奚、汉、渤海、女真、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等等。^①这些民族在共同斗争中,互相促进,并在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契丹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经过辽代二百余年和汉族接触,到了金代,居住在河北、山西的大部分都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和汉族大致相同。住在金西北、东北边境的则从事畜牧业生产。金初,女真统治者为了防止契丹人的反抗,把他们大批地编入猛安谋克,徙居东北。天辅五年(1121年),契丹贵族耶律余睹带领他的部族三千户降金,阿骨打认为“余睹降时,其民多强率而来者,恐在边生变,宜徙之内地。”^②从此迁徙了一部分契丹人到黑龙江地区。次年,“阮定山西诸州,……又命耶律佛顶(契丹人)以兵护送诸降人于浑河路”。天会元年(1123年),“以山西诸部族近西北二边,且辽主未获,恐阴相结诱,复命皇帝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兵四千护送,处之岭东(张广才岭)。”^③大定三年(1163年),女真统治者镇压了耶律斡罕(移刺窝斡)领导的契丹人民起义之后,“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隶女真猛安谋克。”^④就是把参加过起义的契丹人并入女真猛安谋克,由女真奴隶主贵族直接控制。大定十七年(1177年),又把西北路的契丹人徙上京济、利等路。^⑤这部分契丹人原来是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迁到东北以后,转而从事农业生产。^⑥他们和汉族、女真的劳动人民,对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原居住在东北、西北、西南边防地区的契丹人,一部分被女真统治者编入乂军,戍守边境,防止蒙古部落的南下。大定年间,东北路的乂军有二部五乂,共5585户。西北、西南二路的乂军有十。^⑦还有一部分契丹牧民,在金初按照辽代的诸“抹”(“抹”,原指无蚊蚋、水草丰富的牧地)设置群牧,^⑧共十二处,即:斡独碗、蒲速斡、耶鲁碗、讹里都、乂斡、欧里本、乌展、特满、驼驼都、讹鲁都、忒恩、蒲鲜。^⑨群牧中除了契丹人外,还有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成份。^⑩他们饲养马、骆驼、牛、羊。据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的统计:七所群牧共有马四十七万匹,牛十三万头,羊八十七万只,骆驼四千只。^⑪西南路的契丹牧民,还在交通要道“建城市,通商贾。”^⑫可见这些地区的畜牧业生产是相当发达的。

契丹牧民受到女真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三岁大的马匹便被搜刮充当军马,还

①《金史》卷2,《太祖纪》。

②《金史》卷133,《耶律余睹传》。

③《金史》卷46,《食货志》一,《户口》。

④《金史》卷6,《世宗纪》上。

⑤《金史》卷88,《唐括安礼传》;卷44,《兵志》。

⑥《金史》卷7,《世宗纪》中;卷88,《唐括安礼传》。

⑦《金史》卷44,《兵志》。

⑧《金史》卷44,《兵志》。

⑨《金史》卷24,《地理志》上。

⑩《金史》卷44,《兵志》。

⑪《金史》卷44,《兵志》。

⑫《金史》卷81,《耶律怀义传》。

经常派遣官吏检查牲畜的数目,若有损失及隐匿,除赔偿之外,还受处罚。^①正隆年间,完颜亮为了大举南犯,派人到西北路大批征调契丹丁壮,引起契丹人民的反抗,爆发了撒八和耶律斡罕领导的、以契丹人为主包括汉、奚等族在内的大起义。这次起义,“山后四群牧、山前诸群牧皆应之。……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也亦杀节度史术甲兀者以应撒八。”^②起义军的“兵众强,车帐满野,”^③转战长城内外。从正隆五年(1160年)一直坚持斗争到大定二年(1162年),才被镇压下去。这次起义给女真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以很大的打击。金世宗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被迫作出让步,宣布:“应诸人若能于契丹贼(指起义军)中自拔归者,更不问元初首从及被威胁之由,奴婢、良人罪无轻重并行免放。……内外官员郎君群牧直撒百姓人家驱奴、宫籍监人等,并放为良”。^④起义被镇压以后,女真统治者又不得不多次下令释放奴隶,说明了这次起义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⑤同时,契丹、奚、汉族人民在共同斗争中又更加紧密联系。

奚人和契丹人长期保持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阿骨打攻陷了东京路后,废除了州县制,把奚人抑为奴隶,编入猛安谋克,^⑥以挾不野(即大臭)为“东京奚民谋克”,^⑦天会元年(1123年)征服了十三岩(辽宁锦县东)速古、噶里、铁民三部后,又“依东京渤海例,置千户谋克。”^⑧大定二年(1162年)女真统治者对参加过耶律斡罕起义的奚人,采取了极其野蛮的办法,“尽杀其男子,以其妇女孺分给诸军。”^⑨奚人的反抗更为剧烈。以后又把奚人编入猛安谋克,迁到咸平、临潢、泰州等处,从事农业生产。^⑩

还有一部分奚人被组成奚军。天会七年(1129年),徙奚第一、第三部戍云内州(内蒙古乌拉特旗)。这一地区以出产镔铁著名,^⑪奚人在辽代精于锻铁,奚军迁到云内州以后,可能还从事冶制兵器。

渤海人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文化深受汉族的影响。在辽代几经迁徙,分布于辽的临潢、大定、辽阳等处,和汉族杂居。女真反辽之时,由于渤海人同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在阿骨打提出所谓“女真渤海,本同一家”的口号下参加了反辽斗争。^⑫

但在攻陷辽东地区以后,渤海的劳动人民都被编入猛安谋克,由渤海贵族率领。如高彪任榆河千户,^⑬王政任卢州渤海军谋克,^⑭二哥任咸州渤海人千户^⑮等。

① 《金史》卷44,《兵志》。

② 《金史》卷133,《移剌窝斡传》。

③ 《金史》卷133,《移剌窝斡传》。

④ 《金史》卷133,《移剌窝斡传》。

⑤ 参看赖家度:《耶律斡罕领导的抗金斗争》,《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又《历史教学》1963年第1期讨论该文的文章。

⑥ 《金史》卷2,《太祖纪》。

⑦ 《金史》卷80,《大臭传》。

⑧ 《金史》卷77,《挾不野传》。

⑨ 《金史》卷6,《世宗纪》上。

⑩ 《金史》卷47,《食货志》二,《田制》。

⑪ 《金史》卷24,《地理志》上,《西京路》。

⑫ 《金史》卷2,《太祖纪》。

⑬ 《金史》卷81,《高彪传》。

⑭ 《金史》卷128,《王政传》。

⑮ 《金史》卷2,《太祖纪》。



渤海人许多已使用汉姓，有王、高、张、杨、窦、乌、李等数种。^①渤海人还使用汉语文。天眷元年（1138年）金朝廷规定：“百官诰命，女真、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②渤海猛安谋克大量迁居山东以后，在经济文化上和汉族的联系更加密切，而且不少已经同化于汉族了。

回鹘人在北宋时期一部分入居秦川（甘肃、陕西一带），后来女真统治者把他们迁到燕山（河北蓟县东南），他们和汉人通婚的很多。回鹘人的织绣及金饰工艺极为出色。“善结金线相瑟瑟为珥及金环、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克丝，甚华丽。”^③

住在西北甘、凉、瓜、沙等州的回鹘，出产珠、玉、药、香及丝毛织品，“善造鍔铁刀剑，乌金银器。”不少回鹘商人把他们的土产运来燕地，经过西夏时，受到西夏统治者苛刻的剥削。回鹘的商人“尤能别珍宝，蕃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佞，则不能售价。”^④还有回鹘商人来往贸易于山东、河北之间。“回鹘有田姓者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⑤同时，回鹘统治者经常派人入贡于金^⑥。女真统治者又经常购买回鹘的马匹。^⑦回鹘的马和弓矢是女真最高统治者用作赏赐臣僚的珍贵物品。^⑧

兀惹（即温热）是金东北边境的少数民族。辽代被徙居于黄龙府以南的宾州（吉林农安县东北），长期和女真、契丹接触，互相婚姻。^⑨收国二年（1116年）兀惹人被女真统治者编入猛安谋克，由原来的部落酋长率领。^⑩兀惹的上层人物大量地吸收汉族的文化，采用汉姓。南宋的洪皓居留燕京的时候，曾经和兀惹的千户李靖结交，这个兀惹人“学奕象戏，点茶……衣制皆如汉儿。”^⑪

金代东北、西北边境的蒙古部落和女真接触很多。靺鞨人主要从事狩猎，沿长城南接近汉族地区的已经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从河东地区（即金的西京路）得到汉人的铁钱，用来铸造军器，武装力量逐渐壮大。^⑫又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分化，经常南犯金境。女真统治者除了采用军事剿杀以外，还掳掠了靺鞨的劳动人民，把他们贩卖到山东、河北各地充当奴隶；^⑬另外又利用了一部分被征服的靺鞨人监视蒙古部落。到了世宗、章宗时期，为了隔绝靺鞨人的南下，又修筑了一条长三千里的界壕边堡，调遣重兵戍守。当然，这种设施不能完全断绝靺鞨人和金境汉人及女真人的经济文化联系。阻卜的一部分在章宗时曾经受到金朝廷的控制，永安三年（1198年）阻卜酋长斜出附金并在辖里尼要（在内蒙古多伦诺尔东北）

① 洪皓：《松漠纪闻》。

② 《金史》卷4，《熙宗纪》。

③ 洪皓：《松漠纪闻》。

④ 洪皓：《松漠纪闻》。

⑤ 孟珙：《蒙鞑备录》。

⑥ 参看《金史》卷8，《太宗纪》；卷4，《熙宗纪》。

⑦ 《大金国志》卷6，《太宗》四。

⑧ 《金史》卷132，《徒单贞传》；卷132，《完颜元宣传》。

⑨ 洪皓：《松漠纪闻》。

⑩ 《金史》卷2，《太祖纪》。

⑪ 洪皓：《松漠纪闻》。

⑫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靺鞨款塞》。

⑬ 孟珙：《蒙鞑备录》。

开设榷场,互相贸易。①北方的蒙古部、即盲骨子是渔猎和畜牧的部落,“无城池屋宇,但为毡帐,择便利水草而居……无耕织,制皮为裘,以牛、羊为粮。”②皇统六年(1146年)女真统治者派胡沙虎攻伐蒙古部,结果反为蒙古部围困,女真统治者不得不遣派萧保寿奴与蒙古部议和,每年送给蒙古部牛、羊、米、豆。③以后又多次用贡赐的方式,双方交换产品。④盲骨子也有一些人居燕地。⑤

金代初期曾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北羊城之间设立榷场,“以易北方牧畜。”⑥皇统元年(1141年)又设置榷场和西夏进行贸易。⑦前后对西夏开设的榷场有保安、兰安、绥德、东胜、环州(均在陕西、甘肃境)等处。西夏主要输出珠、玉;金主要输出丝、帛。⑧西夏的使节到金,女真统治者还允许他们在使馆内贸易三日。⑨此外,边境间的女真族人民,不顾统治者的种种禁令,越过边界互相贸易的也很多。⑩女真统治者还多次派医师到西夏,为西夏贵族治病,⑪中原的医药可能由此传入西夏。

我们从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之间的联系不难看出:即使象金代那样,由于女真统治者一再发动民族战争,造成民族关系紧张以及政治上南北分裂,我国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仍然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各族人民共同斗争,不断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彼此之间有着互相依存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而汉族的主体和先进作用,又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并不是自发地形成的,而是通过各族人民共同进行阶级斗争推动它向前发展和巩固的。金代北方汉族、契丹、奚、渤海等人民的起义以及广大汉族人民的抗金斗争,都严重地打击了女真的奴隶制,抑制了女真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我国各族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加强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惜流血牺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历史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⑫任何反动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都不能阻止历史的前进!

①《金史》卷50,《食货志》五,《榷场》。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

③《大金国志》卷12,《熙宗》四。

④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

⑤洪皓:《松漠纪闻》。

⑥《续文献通考》卷26,《市舶、互市》。

⑦《金史》卷4,《熙宗纪》。

⑧《金史》卷134,《西夏传》。

⑨《金史》卷134,《西夏传》。

⑩《金史》卷134,《西夏传》。

⑪《金史》卷134,《西夏传》。

⑫《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3页。